

引文格式: 武斌斌. 废名“个人主义”思想的“两副面孔”[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1(3): 102-109.

废名“个人主义”思想的“两副面孔”

武斌斌

摘要: 废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存在。他杂取、糅合中、西、古、今资源,然后“回心”个人,不仅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美学风格,而且形塑了一个复杂而又独特的知识分子灵魂。此中,有一样资源一直贯穿他思想的始终,这便是“个人主义”。终其人生的各个阶段,“个人主义”对废名都产生着十分复杂甚或十分矛盾的影响。就文学表现而言,“个人主义”一方面让废名坚守文学的非功利性,表现出了独特的审美表现主义特色;但另一方面,又让他步入了“趣味主义”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而就文化影响而言,个人主义思潮,一方面让废名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五四”式的、具有英雄主义情结的“启蒙-载道”观,另一方面又让他沾染了浓厚的虚无主义气息,表现出了强烈的悲观主义情绪。就此而言,“个人主义”犹如一面双面镜,构成了其文学与思想的“两副面孔”。

关键词: 废名; 个人主义; 审美; 载道; 趣味; 虚无

作者简介: 武斌斌,文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0.03.012

什么是“个人主义”?很难用一个精确的语词或句子进行明确概括。通论言之,就是指,在时代精神中特别注重个人尊严与个人意志的一种思想主张。“个人主义”在西方思想领域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其辐射领域可达至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化学、文学等各个方面。本文所论的“个人主义”,主要涉及文学与文化两个方面。对“五四”思想界而言,文学问题与文化问题往往是合而为一的,但对废名这样一个极端重视文学表现功能的“小说家”而言,文学与文化问题又是有所区别的。在文学方面,他强调以作家为本位的审美表现主义;在文化方面,他则重点强调启蒙思想家所能传达的“载道”功能。但此二者又各有其独特的对立面:在他强调审美表现的同时,“趣味主义”的阴影如影随形;而当他以“启蒙-载道”的“个人主义”思想布道宣讲之时,一股悲观主义的情绪又笼罩其中。可以说,“个人主义”犹如一面双面镜,构成了废名文学创作与文化思想的“两副面孔”。

一、文学上的“审美表现主义”与“趣味主义”

早期的废名是一个精心构撰艺术王国的“小说家”。我们可以指责他的小说题材狭窄、主题模糊、人物性格不鲜明等等,但我们却不能据此否认他文学创作态度的严肃。正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说,区分“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首要标准在于创作者的态度是“以人的

生活为是”还是“以非人的生活为是”^[1]。废名所写虽大都以乡村翁媪、少女、儿童的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但其情致的活泼、生命的灵动，显然是“个人”的表现，故此，他的“个人审美主义”具有典型的、积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以“个人”为中心的审美表现主义一方面让其在文学创作中坚守了文学的独立性、创造性、自主性与自由性；另一方面，又让其在无形之中沉溺于小说“技”的层面而无法自拔，最终让文学创作步入了“趣味主义”的泥潭。

（一）以“个人”为本位的“审美表现主义”

“个人主义”在西方曾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等各个时期，不仅在时间上历史悠久而且在内容方面也涉及面宽广（涉及了政治、经济、伦理、艺术等诸多方面）。但在中国，迟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个人主义”才作为一种先进的资产阶级价值理念被引入了“五四”思想界（涉及面也较为狭窄）。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这不仅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也标志着“个人主义”价值理念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对比了东西民族的思想差异，指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中国要振兴就必须“以个人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2]。随后，鲁迅、胡适、吴虞、李亦明等人皆以个人主义为武器，向封建传统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此后，随着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与文化两个场域的继续深入，个人主义思想也在这两块领地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就思想而言，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有着共同的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与道德的目标，故其在思想上皆十分认同个人主义的“战斗”精神。但就文学而言，由于对文学表现功能的认识不同，“五四”新文学界对“个人主义”文学观的认识出现了一种“不期然”的分歧。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一方面以“国民”“社会”等“新道”（个人主义的时代精神）取代了传统文化的“旧道”（“文以载道”观），主张以此“道”攻彼“道”；另一方面，却又不遗余力地、大张旗鼓地宣扬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立性，认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价值也，而文学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3]。就此而言，“五四”先行者们对此一矛盾与分歧或许是根本无意顾及，或许是根本就没有发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不同的个人主义文学观就像两颗不同的种子，终究孕育出了两种不同的乃至差异十分巨大的文艺思想：前者以实用论为目标，先后与启蒙主义、革命主义、政治主义等多种外部资源相结合形成了极具反抗性的文学思想；后者则坚守文学本身的价值功能，将自身局限在“文学本体论”“作家本体论”等相对狭隘的价值理念中，发展出了一种纯文学性的、注重审美的文学风格。废名所继承的显然是后者，他以哲学上的个人本位主义为基础，构建起了属于他自己的文学本体论与作家价值观。

废名对自己创作的分析并不多见，比较有名的有两篇：一篇为1927年写作的《说梦》，一篇为1947年在一次会议上的谈话。在《说梦》篇中，废名第一次高扬“文学是梦”的旗帜，指出“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当’。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是梦，所以与当初的实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艺术的成功也就在这里”^[4]¹¹⁵⁴。他认为，“著作者当他动笔的时候，是不能料想到他将成功一个什么。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之不可捉摸。然而一个人只能做他自己的梦，所以虽是无心，而是有因。结果，我们面着他，不免是梦梦。但依然是真实”^[4]¹¹⁵⁵⁻¹¹⁵⁶。“梦”是中国现代作家十分喜欢描写的一个表现对象，但把“梦”作为写作原则上升到创作论高度的恐怕只有废名一人。废名的“文学是梦”观最为强调的是“一个人只能做他自己的梦”。就此而言，他深信创

作的最佳方式即为“表现自我”，好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必须是作者最为独特的个性。废名的这一文学观一旦建立，就根深蒂固，哪怕是时隔二十几年之后，在一次有关文学方向的讨论会议上，废名仍然认为文学就是作家个人的表现。“我深知文学即宣传，但那只是宣传自己，而非替他人说话。文学家必有道，但未必为当时的社会承认。”^{[5]3390}“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5]3392}“我所写的东西是个人的主观。”^[6]由此可见，从“五四”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废名“个人主义”的文学观一直贯穿始终。以“个人为本位”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个集中表现。如郭沫若就曾宣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个曲，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天才的自然流露。”^[7]庐隐也相信“足称创作的作品，唯一不可缺的就是个性”^[8]。郁达夫更是直接认为文学作品就是作家的自叙传，“艺术所真真返照者，是观察者，并不是生活自己”^[9]。废名虽然没有像以上作家一样直接陈述自己对文学“个人性”的重视，但无论是从他自身的创作表现中还是从他对其他作家的评价中，我们都可窥见“个人性”之一斑。此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废名对鲁迅的评价了。早期的废名对鲁迅极具好感，他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对鲁迅的支持与认同。如在《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中，废名曾说：“说到鲁迅先生，我要提出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个性的表现。”^[10]在他看来，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先生能够将自己“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投射到文艺中去。在另一篇提及鲁迅的文章中，他更是盛赞鲁迅敢于“画出自己的心和梦”，是“真的诗人”与“批评家”^[1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鲁迅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废名认为他“好名”，“走向了群众”，“丢失了自我”，故在时代转折之际与鲁迅彻底分道扬镳了。我们且不说此时废名的评判是否正确，但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个人主义”的极端重视。故此，与其他现代作家相比，废名也许不是最早提倡文学个人主义表现的那一个，但他对个人主义文学观的坚守可谓是持续了终生。这其中，尽管文学表现的内容可能会随着作者思想认识的深化而发生变化，但其表现的宗旨却一直未变。“它（个人主义的文学观——笔者注）把一个全新的原则——表现自我，独具特色提到美学中心，从而带动了文学各方面的要素都围绕着一个潜在的中心点——作者自己——旋转。”^[12]在废名的文学创作中，无论是描写日常生活琐事，还是以自我为原点张扬“道”的奥妙，甚或是针对社会现实陈述自己的文化批评，他的文学表现都可以说是围绕着“作者自己”而形成的。这样的表现方式一方面决定了废名小说创作题材的狭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五四”个人主义精神的执着坚守。对废名来说，即便文学表现的都只是些“起居坐卧”的小事，但只要它们是“个人的”，就不失为“整个人类的”，标榜个人的独立性与自由性就是为整个人类争独立与争自由。

（二）以“个人”为中心的“趣味主义”文学观

废名以“个人”为中心的审美表现主义，不仅具有反抗家族、传统、载道等封建文化传统的积极意义，还有与人类命运共通的世界性的积极意义。但难敌社会现状的黑暗，救亡压倒启蒙的迫切，在中国，仅就文学思潮而言，这股“五四”时期风起云涌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潮”也并未能保持其生命的长久性与活跃性，而是很快便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的退去而滑向了“趣味主义”的泥潭。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非常黑暗、混乱的一段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各种“事件”或“事变”比肩接踵，不仅人民的生命、财产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而且知识分子的正义之声往往会被当作“反革命”之音被无情压制。面对此种境遇，中国知识界逐渐形成了两股

分流：积极向上者强烈主张将文学与革命相结合，充分调动文学振奋人心的感染力，鼓舞人民加入反压迫、反专制的行列；而另一部分现世主义者，则选择了后退、蛰居，“苟全性命于乱世”。不同的人生观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学观。主张文学与革命相结合者，必然要求文学之“重”，之“严肃”，之“载道”；而主张文学与现世安逸相结合者，则必然极力宣扬文学之“轻”，之“性灵”，之“言志”。前者以左翼文学为代表，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充分酝酿之后，终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形成了“革命文学”的高涨热潮；而后者则经由前期京派的渲染、后期京海合流的壮大，逐渐形成了一股反时代潮流的“趣味主义”文学思潮。有关“趣味主义”文学思潮形成的原因，本文不及详解^①，但其中，现世“个人主义”的思想必是其至关重要的因素。以周作人为例，在1923年之后，周氏一反先前的“战斗者”形象，或主张开辟一块“自己的园地”种植蔷薇与地丁；或主张在“十字街头”建一座玲珑宝塔，超然而悲悯地静观人生。他的这种现世“个人主义”思想反映在文学创作上，要么表现为主张“文艺上的宽容”与“教训之无用”；要么堕入“趣味主义”的泥潭，号召“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有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13]。这都是个人主义文学思潮消极面的表现。以周氏为“先导”，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以“趣味”为中心的文学创作者。而废名作为“周门四大弟子”之一，或是无意间受到了乃师的熏染，或是有意追随乃师的步伐，总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②，他也走向了“趣味主义”的泥潭。如，其后期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沈从文认为，“作者因为作风把文字转到一个嘲弄意味中发展也很有过，如像在最近一个长篇中（《莫须有先生传》——《骆驼草》）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下，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14]。这正是废名追求“趣味主义”的表现。再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废名以《骆驼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为基地，还创作了一批颇为精致、颇具学术性的小品文，如《知堂先生》《关于派别》《蝇》《莫字》《三竿两竿》《孔子说诗》《陶渊明爱树》《陈亢》《如切如磋》《中国文章》《女子的故事》《神仙的故事》《赋得鸡》等等。我们甚至无须详看内容，单从作品题名即可看出，其内容要么表现的是“草木虫鱼”，要么表现的是“名人轶事”“经典感悟”，这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年代何尝不是“趣味主义”的典型表现？有鉴于此，王富仁先生曾做过精彩的评判，他指出，这一批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但却不是在‘自由’中追求，而是在‘自由’中安居；不是作‘个人’的抗争，而是作‘个人’的栖息。用‘自由’的名义逃避自由，用‘个人’的名义放弃个人……当（他们）把‘荒诞’指证为‘正常’，把‘混沌’当作‘清晰’，把‘迷惘’称为‘清醒’，把‘无为’确认为‘有为’，现代主义

①相关研究可参阅赵海彦：《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周作人主张以“趣味”为中心的文学创作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自己的园地》。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废名在思想上与周氏并不一致，这从他个人的回忆——“自己原来是很热心政治的人”（废名：《〈废名小说选〉序》，出自陈振国：《冯文炳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给周作人散文钞作的序言——“聊天的内容也是关乎实际的问题居多”（废名：《〈周作人散文钞〉序》，出自王风：《废名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5页），以及致徐炳旭的信件——“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情形非常可怕，而我说的可怕，不在恶势力，在我们智识阶级自身！一般所谓的学者们，在我看来，只是一群胖绅士，至于青年，则几乎都是没有辫子的文童！所以目下最要紧的，实在是要把脑筋还未凝固，血管还在发热的少数人们联合起来继续从前《新青年》的工作”（冯文炳：《通讯》，《猛进》，1925年3月27日，第4期）等多处可以看出。废名思想的转变主要是在1930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事件之后，比其老师周作人的“通透”要晚八年左右。

精神旅程便变成了古典主义的精神休息”^[15]。就此而言,不仅周作人,包括废名在内的一批人其实早已深刻濡染了个人主义精神的消极因素,丧失了再谈个人主义的“资格”。

二、文化上的“启蒙-载道”观与“虚无主义”

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个人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法,而且是一种文化人格的具体表现。但正如“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观,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伪”或“假”的一面一样,文化上的“个人主义”也有两副不一样的面孔:积极的个人主义可以激发人的强力意志,让人产生一种大解放、大创造的能动精神;但其消极的一面则隐含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悲观、幻灭、虚无之感。

(一) 以“个人”为本位的“启蒙-载道”观

在1947年末有关“今日文学的方向”的讨论会议上,废名曾说:“我以为文学家都是指导别人而不受别人指导的。他指导自己同时指导了人家。没有文学家会来这儿开会,因为他不会受别人指导的。我深感今日的文学家都不能指导社会,甚至不能指导自己。我已不是文学家,所以我才来开会。”^{[5]3390}此语虽是戏言,但也确实反映了废名对自我“身份”的明确定位。熟悉废名作品的人可以轻易地发现,“废名”时期的废名与“莫须有先生”时期的废名简直判若两人。前者极力追求唯美、梦幻、含蓄,后者则极力追求真实、坦率、直接。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与他对“文学”与“思想”的不同功能定位有很大关系。对此,如果说前期的废名是一个“小说家”,以“指导自己的同时指导别人”为目标的话,那么后期的废名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思想家”(只求努力指导别人)。废名这一身份的转变与时代氛围的变化不无关联,但从根底上而言,这反映的还是“个人主义”思想由“文学”到“文化”重心的变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废名,坚守文学本位主义,反对“文以载道”观,这是以“文学”为武器反抗封建思想与文化,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废名舍弃文学家的地位回到现实生活,主张以“个人主义思想”为武器反抗黑暗社会现实。

废名后期思想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还是佛家出世而不离世的大救赎精神都对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人格方面就完全等同于封建士大夫。“五四”知识分子多“别求新声于异邦”,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独立、个性等精神改造思想界。废名与之不同,他虽然也接受过西方现代精神的洗礼,但他更关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他以全部的生命承接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资源,并希望它在现代社会中亦能起到积极的社会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个人人格力量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借助西方资源唤醒国民意识,十分推崇“刚毅不挠”的人格力量。无论是鲁迅还是郭沫若,他们都曾多次呼唤一种“超人式”的人格来参与历史的发展与建构。废名笔下虽没有这种气势磅礴、摧毁一切不合理现实的“超人”形象,但他挖掘传统资源中的“智信”传统人格,以释迦牟尼、孔子等文化史上的大人物、大人为榜样,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者”式的“莫须有先生”系列形象,这正是典型的废名式的个人主义的“担当”。第二,对个人自觉的强调。“五四”是一个极度张扬个体生命力的时代,无论是尼采的“超人”意志学说还是柏格森的“生命之流”理论,都十分重视个人的自觉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

重要作用。废名对“个人自觉”的强调主要来源于佛家的“自觉本心”说。在他看来，个人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本净，才能烛照周围的黑暗之渊。他曾在小说中多次强调“无明”的烦恼只有靠“自觉”才能打破，这不是对传统佛学思想的简单照搬，而是对现代独立人格培养的一种真诚期待。第三，对个人自我牺牲精神的强调。“五四”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不仅勇于追求个人“合理的做人”与“幸福的度日”，而且往往以博大的胸怀与开阔的胸襟勇敢承担人类集体的苦难。如鲁迅，他在发现自己因袭的重负之后，主动选择成为历史的“中间物”，以自己的身心完结几千年的旧账，放年轻的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16]。废名虽没有鲁迅这种“决心自食”的勇气，但就自我牺牲精神而言，他深受大乘佛教“菩萨行”观念的影响，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誓言自勉；以孔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群体”责任意识自励，表现出了他对个人牺牲理念的诚挚赞同。综上，总体而言，此一时期，废名在文化上的个人主义思想虽“取材”于传统资源，但他一则对其进行了鉴别与筛选，二则对其进行了现代性的“改造”，使之具有了全新的时代精神，这正是“五四”时期典型的具有英雄主义情结的个人主义“启蒙-载道”观。

（二）无法逃脱的“文化虚无主义”

有关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我们通常认为二者是互动的：个人是文化的传承者，文化是个人的承载者。但在王纲解纽、时代更替的特殊时期，个人与文化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极具张力的紧张关系，而“五四”时期便是这样的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在极短的时间内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思想价值体系，这一方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另一方面也让现代中国人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的虚无之感。“统治中国人达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的价值体系全面走向解体。但这也标志着人失落自己的归属感，迷失自己中心点的开始。人不仅生活在客观的自然界中，也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价值与意义的世界中；人不仅受着自然律与道德律的双重限制，也有着对自然律与道德律的双重依赖，后者的变异决不会亚于自然界的灾难。在旧体系瓦解，新的尚未建立起来之际，人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都无法找到所能依靠、所能遵循的东西，于是人退缩到自我之中，企图在自身寻找中心，却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自己，弥漫于‘五四’文坛的彷徨苦闷的气氛，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精神特征的反映和表现。”^[17]这段分析极其生动地揭示了“五四”之际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他们一方面以西方思想资源为武器，在一片混沌之中发现了“自己”；但另一方面又在发现自己之后突然意识到“发现自己并不意味着了解自己”。故此，他们茫然无措，不知该走向何方，一种生命的虚无感油然而生。废名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他对这种文化断裂之后产生的虚无感也感同身受。如，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歌、小说、信件中曾频繁地表示自己“心焦灼得要炸了”^[18]，觉得自己“寂寞得要死了”^[9]，认为自己“空虚得很，没有着落，也无从谈起”^[19]，也曾不无悲观地感慨“人生就让它是一个错误的堆积又算什么呢？”。但他又难以忘怀知识分子的责任，“总是顾虑、顾全彼此的生活，因为我懂得许多，对于因为生存而消失生命我不欲随便说话”^[20]。总之，整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废名都被一种文化上的虚无感所裹挟，他迫切地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来充当自己的“自然律与道德律”，让自己焦灼的心冷却下来。于此之时，在阅读了大量的孔孟儒家以及佛经著作后，他杂糅各家，取儒家的“仁”“善”“中庸”，道家的“无为”，佛教的“无我”等传统思想而熔于一炉，建立起了一种

沟通彼此、相互支撑的综合文化观。但正如鲁迅所担心的那样,在取法传统的同时,废名也不自觉地中了传统文化的“毒”。他取传统文化资源的精髓抵抗“五四”反传统之后的虚无之境,不仅没有反抗成功,反而助长了自身的虚无主义气息。如,他取法佛教“性空”思想,凭借“无我”反抗社会现实,但其结局却只是获得了一种个人主义的解脱,离大乘佛学所谓的“普度众生”距离甚远。这在《莫须有先生传》一文中有典型表现。“莫须有先生”在下乡的过程中虽竭尽全力为众生说法,奈何芸芸众生根本不为所动,故说法最终只能以“莫须有先生传可付丙”,皆大欢喜而告终。又如,废名取法于道家的“无为”思想,主张知识分子应发挥榜样的力量,引导民众“无为而治”,但这显然还只是道家小国寡民思想的翻版,这在现代“事功”社会中不是“无为而无不为”,而是根本“无所为”。《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篇中,“莫须有先生”虽对三记抽兵以及石老爹被捕等事件严重不满,但采取的仍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姿态,故其结局只能是官府对其存在“熟视无睹”,并未对受难者的结局产生任何的影响。再如,废名取法儒家,主张以家族为中心,重建中国农村文化传统。这在当时黄梅乡下一隅或许有其合理之处,但就整体而言,这种取法显然早已违背了“五四”个人解放的自由主义精神,是一种反时代与反自我的思想主张,其结局的失败早已在意料之中。总之,废名一方面以传统对抗“虚无”,但另一方面又不免被传统的“虚无主义”空气所感染,从而助长了自身的虚无主义气息。这既是废名的悲剧,也是时代新旧交替之际不能跟上社会潮流勇于前进的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表现。

综上,无论是作为文学写作思想指导的“个人主义”,还是作为文化表现功能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作为贯穿废名艺术创作、思想人格、价值理念的一条重要线索,在废名人生的各个时期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诚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事物就其本质而言都具有互相对立、互相支撑的两个不同面向,“个人主义”在废名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表现中也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这两副面孔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以不同的力量影响着废名的人生抉择,真可谓是“成也‘个人’,败也‘个人’”。

参考文献:

- [1] 周作人. 人的文学 [M] //钟叔河. 周作人散文全集: 第2卷.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89.
- [2] 陈独秀.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J]. 青年杂志, 1915, 1 (4): 10-13.
- [3] 陈独秀. 随感录: 十三 [J]. 新青年, 1918, 5 (1): 76.
- [4] 废名. 说梦 [M] //王风. 废名集: 第3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5] 今日文学的方向: “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记录 [M] //王风. 废名集: 第6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6] 废名. 《废名小说选》序 [M] //王风. 废名集: 第6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268.
- [7] 郭沫若. 文艺之社会的使命 [J]. 文学, 1925 (4): 1-3.
- [8] 庐隐. 创作讨论: 创作的我见 [J]. 小说月报, 1921, 12 (7): 25-29.
- [9] 淮耳特. 《杜运格来》的序文 [J]. 达夫, 译. 创造季刊, 1922, 1 (1): 145-146.
- [10] 废名. 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 [M] //王风. 废名集: 第3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187.
- [11] 废名. 就算是搭题 [M] //王风. 废名集: 第3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195.
- [12] 李今. 自我意识与“五四”新文学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0 (3): 120-141.
- [13] 周作人. 笠翁与随园 [M] //周作人. 苦竹杂记. 长沙: 岳麓出版社, 1987: 58.
- [14] 沈从文. 论冯文炳 [M]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 第16卷.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147.
- [15] 王富仁.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 下 [J]. 天津社会科学, 1996 (5): 95-102.
- [16] 鲁迅.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M]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35.

- [17] 李今. 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 [M].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96.
- [18] 废名. 杂诗 [M] //王风. 废名集：第3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90.
- [19] 废名. 邮筒 [M] //王风. 废名集：第3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41.
- [20] 废名. 莫须有先生传 [M] //王风. 废名集：第2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22.

“Two faces” of Fei Ming’s “Individualism” Thoughts

Wu Binbin

Abstract: Fei Ming holds a distinctive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taking and combining the Chinese, western, ancient and modern resources and “returning to his own mind”, Fei Ming not only forms the distinctive aesthetic style, but also forges a complicated and unique intellectual soul. Among them, one kind of resources remains there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his ideas, i. e. “individualism”. During each phase of Fei Ming’s life, “individualism” exerts rather complicated or contradictory effects on him. In terms of literature creation, on the one side, “individualism” let him keep the non-utilitarian principle of literature which shows the feature of the aesthetic expressionism; but on the other side, it traps him into the quagmire of “doctrine of taste”. In terms of cultural influence, on the one hand, individualism enables Fei Ming to realize the longed for view of “enlightenment-truth conveying” with a heroic complex which embodies the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on the other hand, individualism taints him with nihilism which reveals strong pessimistic feelings. For these reasons, “individualism” is like a double-sided mirror, which constitutes “two faces” of Fei Ming’s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Keywords: Fei Ming; individualism; aesthetics; truth conveying; taste; nihilism

（收稿日期：2019-10-09；责任编辑：陈鸿）